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亡灵祭坛】	那年冬至日烧纸	王冀豫
【研究报告】	文革“斗争会”（三）	王友琴
【当事者言】	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下）	徐景贤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亡灵祭坛】

那年冬至日烧纸

• 王冀豫 •

42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其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四合院”是北京符号，“院”也就成了驻京党、政、军机关宿舍区的符号。军队大院狭义地讲就是北京公主坟以西按顺序排列，空军、海军、军事训练总监部、军委通讯兵部、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等各军兵种、军队院校的宿舍区。

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简称，现在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同学常××急匆匆地到我家：“粮校（即北京粮食学校，是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的‘四·三’派阶级报复，昨天把他们学校‘老兵’、高三的唐××在路上绑架了，学校军代表斡旋，今天中午才放，在里面他被殴打、侮辱。他们还正在这条路上抓捕殴打穿军装的同学呢。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打他们）。 ”

我积极响应，并召集了几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二十几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

我在整个队伍的前面，骑车带着同学朱××。临近“粮校”门口，遭遇“四·三”派同学袭击。我和另一个骑车的同学班××冲了过去，其他同行的同学被截在后面。满天的石块密集地砸在地上……

我们三个人首先到了师院附中，见几位高中生在紧张地争论着什么，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见到我们后呵斥我们要听话。当时我并不以为然，但也不知该怎么办。

大约一小时后，绕道进师院附中的空军大院同学张××对我说：“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即北京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李红星没当回事儿。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翻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李红星是育英中学足球队主力，平时为人低调，自信平和，大家都很喜欢他。

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师院附中“老兵”高三的栾××追着我说：“小黑子（大家一直叫我黑子），这是武斗。我们也很气愤，能策略点儿吗？”“不能！不能！”我们喊成一片。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师院附初中“老兵”与我们本就同属各个大院，无论“十一”、“七一”、“六一”的，还是“育鹏”、“育英”的，都是从小经保育院、小学两部制长大的，大多是同学，共性太多。但高中生是哥哥辈们，平日“傲慢”、“少沟通”，无论多正确，此刻的劝阻只能令人更加逆反。

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现在很多细节已无记忆，但一种情绪至今还能感受到，就是“仇恨”！好像那天我们的体能、智能都超水平发挥。其实以往的团队训练、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在一个最荒诞的时代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犹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我们到了粮校附近，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就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这种无果的僵持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一个小时后结果来了，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整齐、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使我们真正明白了这是在“武斗”。对方的柳条帽、工作服、标枪和棍棒使很多看热闹的师院附中同学“傻了”。

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

我心里很藐视这些不中用的“好学生”，决意给他们做个样子，捡起一块鹅卵石，跳起来扒住卡车的大箱板，冲起哄架秧子的人群大叫：“打呀！”抡起来对车上的“四·三”派同学乱砸。我方的同学清醒过来，乱石如雨，甚至砸到我的背上。

我感到卡车震动起来，赶快跳下。卡车如风一般窜出人群，向粮校门口驰去。

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我方”溃退成一片，仅剩下翠微、育英、太平路的二十几个初中生和几个不知哪校的同学，且战且退，依仗路边的树，捡石头还击，有效减缓了对方同学的冲击势头。

我见有个对立派同学十分勇猛地冲过来，就在一棵树后躲着。见其距我三米左右，抡圆了给他一石头，将其击倒，转身后撤，并大喊：“女生别慌，跑稳，我们在你们后面。”不知为什么冒出那么多看热闹的女生。

我们二十几个初中生死死守在人群的最后，其中高中的只有栾××和王××，后者还拿着相机照相。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掩护。

今日想来很可恶很可笑，这一切完全在无意识中自然形成。事后我们曾以军人的后代、大院孩子、干部子弟、天生的、遗传的等等来解释，也理性地意识到这是生长环境、寄宿制、“共产主义”教育的结果，就是想不到对方也是同学、同胞。当然，他们当时也没想到。今天我们奔六、奔七了，常有聚首，当年的哪派都有，哪种出身都有，坐在一起，竟有一种莫名的沧桑。所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想起来，大家只有感慨的自嘲和悲哀。

“兵败如山倒”，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这样喊，起到了强大的暗示作用。双方追逐打斗呈南北方向。路东侧是一面坡，坡上是玉米地；西侧是民房。

对方同学想不到我们实际上有多仓促、多弱小，见我们竟敢反攻他们，在心理上就有了一种风声鹤唳的疑幻。我的无奈喊叫，增强了这种疑幻，使前面追我们的对立派同学还在继续追的时候，后面的居然已经崩溃了。

那个被我用石头击倒的同学是育英“四·三”派的林×，也是“文革”前全市初中生铅球、铁饼第三名。他一身军装，满脸是血，追到我身后。我不认识他，以为是我方同学，大声叫他到我前面去，我掩护，结果挨了他一棍子，正中头顶。棍子打断了。我眼前的东西呈平行四边形地变换摇晃。预感到他会用打断的棍子刺我，我便用尽全力把我手里的大锄把抡向身后，只感到打中了，他倒了。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头，就用左手护了一下，手腕剧痛，倒把我刺激清醒了。

这是一场武斗中真正的胶着，双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两分钟，胜败即成定局。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

吼过，我挥舞着棍子，把对方同学吓得转身就跑。同时，我方断后的二十几个同学一起转身，一副杀红了眼的架势。对方同学阵形大乱，非常慌乱。

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没有察觉，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反应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身体呈爬行状态时，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我的棍子头呈方形）。

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转身又追其他对立派同学。

棍子打在人们背上嘭嘭作响，竟然无人倒下。其时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看着满地的抛弃物：田径标枪、长柄斧头、各种棍棒、柳条帽，我竟对天狂笑，像头野兽。

所谓乐极生悲，此时“我方”同学陈××从后面跑来，说：“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

我惊呆了，怎么能打死他！还要拿他换人呢！

转身回师院附中。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过了，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

我问校医情况，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了人！

后来我知道他叫“王××”。

这是一种“造就”，在那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代，在革命加拼命的鼓舞声中，以“三忠于四无限”为平台的所有的正统教育，在我身上画了一个荒诞悲哀的句号。我和王××个人之间形成了永不能解脱的负欠，这类负欠一再写在中华大地一代一代人的身上。

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那年冬至日烧纸，给我奶奶我爸爸点的，火柔顺平顺；给王××烧，就是点不着，我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42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2008年

□ 原载《我们忏悔》

~~~~~

#### 【研究报告】

#### 文革“斗争会”（三）

• 王友琴 •

（上接 zk1501a）

#### 三，“斗倒斗垮斗臭”：“斗争会”功能

1966年8月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八条说：“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如果站在文革领导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斗争会”对这个目的确实是一种良好的设计，可以达到把文革的打击对象“斗倒斗垮

斗臭”的目的。为了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需要“斗争”校长和教员；为了摧毁“反革命文艺黑线”，需要“斗争”作家和演员；“斗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才能重建领导班子，实行和文革前有所不同的统治方法。“斗争会”的实践确实不但使得“斗争”对象失去权力和地位，也使得他们失去自尊和信心，而且使得他们失去影响大众的可能。凑近来看在全中国实行长达十多年的大量“斗争会”实例，可以发现其如何实现其功能和目标。

## 1，人数和场地

“斗争会”的最主要的共同特征之一是一定都有众多人数参加。最少会有几十人（比如学校一个班），多则可能成千上万（比如全校），甚至十万人以上（全市性的）。召开“斗争会”的场地有教室、操场、会议室、礼堂，剧场，音乐堂，体育场。

当1966年6月学校全面停课从事文革的时候，在学校的操场上或者礼堂里开“斗争会”。7月底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斗争会”就开到了大型公共集会场所，主要是体育场和剧场。1966年8月初，在北京当时最大的集会地点“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系列“斗争会”。那个体育场有十万个座位。其中有清华附中红卫兵举行的十万人“斗争”“小流氓”的大会，有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斗争”北京大学校一级和系一级负责干部的大会。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可以坐一千人，在文革中也成为重要“斗争会”场所之一。一批中小学校长在那里遭到“斗争”。上文已经写到1966年8月19日晚上那里“斗争”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个中学的领导和北京市教育部门领导人的大会。此外，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女）在这个音乐堂遭到“斗争”后，又被关押在学校楼上，8月20日坠楼身亡。当时她被说成“自杀”，她的同事和家人认为有充足证据说明她是被毒打后丢下楼的。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吉祥戏院，红卫兵把一车一车押来的“牛鬼蛇神”放在戏院舞台上“斗争”和毒打，只有少数人生还。一名受访的中学生讲述了他的红卫兵同学怎么在舞台上一边喊口号把一个二三十岁服装发式比较讲究的男人几大棒就打死。文革中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都停止多年，体育场和剧场、音乐厅实际上就成为“斗争会”会场。这些建筑的设计是为了展示美好的艺术以及精彩的球赛等等，文革中用来展览野蛮和残酷。

在上海，举行了电视“斗争会”。上海是文革的样板城市，“四人帮”中有三个住在上海。上海的“斗争会”和其他地方的差不多，有“特色”的是用了现代技术，通过上海电视台实况播放“斗争会”。据《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文革后由官方撰写但是没有出版销售）：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一年中，上海电视台转播了51场批斗大会，每月转播约4至6场，也有一天内转播两场的。

这份《史话》也具体描写了“斗争会”：1967年1月15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所谓“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石西民大会”，对陈丕显，曹荻秋，石西民等一批领导干部，“坐喷气式”，挂大牌子，揪头发，罚跪，甚至推倒在地，脚踩背部。电视转播这样的场面，无疑是对“喷气式”和“踏上一只脚”的最好最快推广手段。不过在北京并未使用这一方法，显然出于其他考虑。

以下是1968年4月28日《解放日报》上的“电视斗争大会通知”：

### 电视斗争大会通知

兹定于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一时半在人民杂技场召开文化系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检举打击右倾翻案妖风，揭发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其五翻案罪恶活动斗争大会，届时电视台转播实况，希各革命群众组织准时组织群众收看。

大会服务处电话 530220，531558

上海的受访者说，当时一个工人一年的薪水（每月五十元左右）才够买一个电视机（500多元），家中有电视机的人很少很少。工作单位有电视机，电视“斗争会”由工作单位组织工作人员一起收看。看完以后还立即组织座谈，或者马上把本单位的“阶级敌人”拉出来“斗争”。上海当时有二百万工作人员，还有大量大中小学的学生。可以想见，每场“斗争会”都有数百万人观看。51场电视“斗争会”，观看人次上亿。

文革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斗争会”，是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大学“斗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那天清华校园里人山人海。主办“斗争会”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广播站声称有40万人参加（后来一般的说法是30万）。主席台设在模仿莫斯科大学建筑的巨大主楼门前的台阶上。王光美低头站在一张桌子上，身后两侧各有一名站在另外的桌子上的红卫兵，一手按她的肩膀一手拉起她的一条手臂。几百名高级干部“陪斗”（前面已经介绍了这一汉语新词）站在地面上，其中有原北京市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薄一波以及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等，每人身后也有两个红卫兵架其作“喷气式”。红卫兵强迫王光美穿上了1960年她作为“国家主席夫人”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的天蓝色旗袍，头颈上挂了一片黑色的心脏形状的牌子，表示她有“黑心”，另外还挂了用乒乓球穿成的“项链”——因为她出访时佩戴了珍珠项链，三个月前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和大学生谈话中特别讲到了王光美的项链（1966年12月28日），否则学生不会想到11年前王光美在印度尼西亚戴了项链的事情。“斗争会”由当时闻名全国的造反派红卫兵领袖蒯大富作主要讲话。美国人李敦白（Sidner Rittenberg，1946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在中国，文革后离开回美国）也在会上发言。这个“斗争会”开了两小时40分。

一名受访者说，他当时是初中生，从城里赶到清华大学，人太多了，怎么也挤不到主席台前去。“我站的地方太远了，只看到了台上的一个小蓝点。”（那是王光美的天蓝色旗袍。）还有一名受访者比较接近主席台，她看到了用乒乓球穿成的“珍珠项链”。

从主持开会的蒯大富，到背后操作的江青等人，显然都认为要“斗倒”王光美和她的丈夫刘少奇，那时刚被《人民日报》不点名地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需要开一个最大规模的“斗争会”。所以，已经开过很多次大型“斗争会”的体育场，已经不再是合适的场地。现在进清华大学南门看到主楼前方两侧盖起的很多新大楼，不难想象出当年大片平地上的巨大人群的场面。王光美身上挂有“黑心”和乒乓球“项链”，像京剧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披挂登场，不过是反派角色的形象。一个美国人的出场，更给这个大会带来了“世界性”的意味，似乎刘少奇已经不单被全中国人“打倒”，而且也被全世界人“打倒”。（李敦白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尽管这显然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有最多观众的演讲。）

王光美“斗争会”显然鼓舞了别的大学的“造反派”。7月，在中南海西门的红墙外，发生了几十万人参与的“揪刘”运动。北京的所有“造反派”组织全部积极参加，尽管他们已经分裂为两大派正在互相打来打去。他们的要求是：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争”。为此他们在中南海门外静坐甚至进行了绝食（是假绝食）。最高领导没有把刘少奇交给他们“斗争”，而是在他们开始“揪刘”31天之后，8月5日，在中南海红墙里面召开了“斗争会”，“斗争”了刘少奇，还有邓小平以及陶铸。

在历史事实的对比中，我们看到的是，在“表演性审判”之后，布哈林被判死刑，他秘密写了一封信给未来世界的人们，让他的妻子背诵下来销毁了原稿。后来，她的妻子向世界公布了信的全文。刘少奇死于长期监禁中，却没有留下任何遗言。1980年他得到“平反”后，王光美对于他们的文革遭遇，没有说什么。这不能只解释为他们的个人性格差异所导致，这和“批倒批垮批臭”的“斗争会”直接有关。在30万人甚至还有“世界”的“革命人民”面前，

王光美 / 刘少奇没有任何反抗，也不能反抗。尽管他们在通向权力的过程中有过长期的革命经验，此时却只有配合被“斗争”。他们不但被剥夺了权力被“斗倒”了，也在思想上被“斗垮”了。在这方面，可以看到文革领导人非常“成功”的一面。

至于对看到这些迫害场景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的威慑力，是不难想象的。最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没有人敢于同情被批斗者，更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这种迫害。

## 2，频率和长度

文革中在“斗争会”上被“斗争”的人数很多，而且每个被“斗争”的人一般不止被“斗争”过一两次。在我采访过的人中，“最高纪录”是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韩作黎被“斗争”了400多场。他说他数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斗争”的场数。数到第400场以后，他停止了计数。如果每场有300人参加，总计就有12万人次参加过对他的“斗争”。实际上，参加每场“斗争会”的人数常常远不止此数。例如他1966年8月19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舞台上遭到“斗争”时，那个会场有一千座位。

韩作黎告诉笔者（1995年采访）：批斗我，先在城里，后来又到各区县游斗，坐“喷气式”400多次，打得昏死过去两次。1966年8月19日，四、六、八中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把我也弄去了。八中校长温寒江，用带铜环的皮带，在他的背上和头上打，当场打昏死过去，地上流了一滩血，被拖下台去。四中校长杨滨也在，跪在那里，又踢又打。教育局长孙国梁，红卫兵把他的肋骨踢断了三根。八中的华锦，几天后死了。（笔者注：华锦在会后继续遭到毒打，1966年8月22日死于该校校中。）

据资料：1968年4月23日到10月27日，经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批准的批斗北京市主要领导干部和中央部门领导干部的群众大会就有100场，其中批斗彭真53次，刘仁40次，郑天翔29次，万里14次，被批斗的还有陈克寒、赵凡、冯基平、崔月犁等。被批斗的中央领导干部有：彭德怀，薄一波，罗瑞卿、陆定一、蒋南翔、马文瑞等。在批斗中长时间弯腰、挂牌子、“坐飞机”以至被殴打。这种批斗会波及全市，各区、县、局，大批基层领导干部都遭到批斗。（《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编，1984年“内部”印行。）

文革的头三年，1966—1969，“斗争会”规模和频率都最大，但是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次推向高潮。清华大学已经成立的文革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中，老干部刘冰和军代表惠宪钧等人反对上文写到的迟群，他们把信送到邓小平那里转交毛泽东。毛泽东鲜明表态支持迟群。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惠宪钧遭到214次“斗争”，其中包括“喷气式”。（他和唐少杰的访谈，《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六期）

除了高频度，“斗争会”的时间长度也应注意。上面写到的王光美“斗争会”，进行了2小时40分钟，因为已经达到了可能的最长时间，如果延续，30万人要上厕所就会造成大混乱。但是不那么大型的“斗争会”却可能开得很长。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她是1966年8月5号“斗争会”的幸存者，那天她被打坏了腰骨，她的同事卞仲耘副校长被打死），在1968年秋天被连续“斗争”过48小时。该校“工宣队”说她“态度恶劣”，组织中学生轮班“斗争”她，不准她睡觉。一名当时19岁的学生有癫痫病，被分配在半夜时段，恐怖和劳累使她在“斗争会”上癫痫发作。在笔者的调查采访中，被“斗争”时间的“最长纪录”是72小时。北京大学物理系黄敦老师曾留学苏联，1968年，他在军队作研究的同学在手枪威逼下“交代”了自己是“苏修特务”（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把他也牵连进去。他实在说不出他们的“特务活动”，因此被罚站，罚跪，不被准许睡觉，被连续“斗争”了72个小时。“斗争”

他的人中，有学生，也有军人。他说，幸亏他当时年纪还轻，身体还好，居然没有倒下。（2009年访谈）

在这样长时间的“斗争”中，人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摧残。在网上会读到一些文章，议论为什么在文革后的中国文学中关于文革和反右的作品中，看不到《日瓦戈医生》中的境界以及“自由的心灵”。原因当然远远不止一个，不过试想应该怎样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确实首先想到了那位作者帕斯捷尔纳柯没有遭受过“斗争会”。尽管他和别的俄国作家在斯大林时代都受到严重迫害，但是他还能保持“自由的心灵”。中国的情况不一样。

### 3，展览性

回顾人类文明中“罪与罚”的历史，从古代到现代，可以看到一个发展的脉络和趋向，即对惩罚，特别是处死过程，越来越少展示给大众。在这方面，傅柯的《规训和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作了尤其详细的考查。第一部分写了历史上身体惩罚和公开展示的关系：在19世纪，一方面，肉体惩罚越来越少公开展览（英文本，第8页），比如从监狱到刑场的游街仪式取消了；另一方面，折磨身体的方法少使用了，例子是能很快杀死一个人的断头机的发明和使用（第25页）。虽然傅柯的这种概括是建立在对欧洲历史的这方面的知识上的，中国古代的历史也能证明这一点。例如，古代有“示众”，把定罪了的人放在木笼子里展览给大众看，死刑刑场也开放给大众观看。这些都不是现代司法系统的做法。

但是，文革中“斗争会”上发生的野蛮和残酷的事实，恰恰和历史走势的方向相反。文革“斗争会”的共同特性是公开展览“斗争”对象和过程，努力制造更大的示众效果。上文已经说到“游斗”。而作为“斗争会”的延长，“示众”也常被采用，即让被“示众”者长时间站立在某个显眼的地方，为了供更多的人观看。数位受访者说起，他们曾经在北京目睹共青团中央领导人、中宣部诸领导、文化部诸部长在他们昔日掌权的机关大院被“示众”。上海的一名受访者说，绍兴戏（上海人一般这样称越剧）名演员被“示众”的时候，有中老年女戏迷纷纷前往，带着崇拜和同情，所以很快不再“示众”名演员，以免发生太多“副作用”。

上文已经介绍了“斗争会”的场地常常很大，人数常常很多，这都是为了增强其展览性。“斗争会”场上有高音大喇叭，也常常插了很多红旗。被“斗争”者戴高帽子，胸前挂写有罪名和名字的大牌子，名字上又红色大叉子。这些，都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量。上文写到的王光美被“斗争”时身上挂的用乒乓球穿成的“珍珠项链”，是典型的对原物充分“放大”以增强视觉效果。所谓“喷气式飞机”更是如此。下跪也表示投降和顺服，但是却不如“喷气式”更被“斗争会”普遍使用，显然因为“喷气式”张开后举的双臂和站立姿势，再加上身后的两个按头拽胳膊的人，明显地“放大”和突出了被“斗争”的人的屈辱形象。

在采访中，笔者发现，受访者往往都对“斗争会”有相当清楚的画面记忆，尽管他们可能已经不记得那天是哪年哪月哪天。文革中因为一些人写日记成了“反革命”，所以几乎没有人写日记（请见我的文章《摧毁日记的革命》）。很多事情都被忘却了，然而很多人记住了他们目击的“斗争会”场面。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斗争会”在制造视觉效果和心理震撼方面的成功的效果。

上文讲到了北京大学在1969—1970年的“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中召开七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在第二个大会上（1968年8月8日下午），在北大东操场的全校万人大会上，军代表大声宣布逮捕“美日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信德。观众中，早已埋伏在陈信德旁边的人把他抓出来推到台子上，铐上手铐，由公安人员带走。陈信德是东语系日文教员，中国最好的一部日语语法书的作者。他的妻子是家庭妇女，那天一早陈的学生到他们家中，



通知她也去开会。在会上她听到宣布十分震惊，一下子站起来，立即也被已经安排在她四周的人围住压她坐下。陈信德被抓走后，并无审判也无判决，也不准家属会见。一年多后，1970年12月陈信德在山西长治监狱中去世。

紧接着，8月15日，在同样地点再次召开同样规模的大会。主持大会者先领导一万与会者一起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好象扫帚不到，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然后，军宣队负责人在台上的扩音器前大声问：“我们的队伍里，有没有反革命？”停顿片刻，大喊一个“有”字，然后，高声宣布：“现在，把章廷谦揪上来。”话音一落，埋伏在人群中的打手一下子就把中文系教授章廷谦揪上了台。军宣队的人宣读材料后，章廷谦被戴上手铐塞进一辆汽车带走。他的“罪名”是他不承认30年前当过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国民党区分部委员。

这两个“斗争会”景象都是事先精心策划过的，简直像电影里的戏剧性场面，也确实发生了强烈的威慑效应。公安人员，手铐，警车，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文质彬彬的北大人来说是他们过去不曾想象会降临自己头上的东西。在这样的威吓下，随后在北京大学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上，很多人被迫承认，是“潜伏”下来的美国特务（曾在美国留学），是“披着教授的外衣，干反革命”，等等。更严重的是，有的“揭发”别人在私人谈话中的“反动言论”，有的“揭发”别人要“叛国投敌”。因为不愿被“从严处理”，他们做这些争取“从宽处理”。

1990年代，北大中文系音韵学教授林焱在和笔者的谈话中说，章川岛被铐上手铐带走的那个晚上，他和妻子杜老师整夜不能睡觉。他被迫承认他曾经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和参与策划炸掉北大未名湖边的水塔（那个塔看似佛塔其实是水塔）。因为否则就要像他的同事章廷谦一样被“从严”。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作为音韵学教授，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能炸掉水塔。他告诉笔者，他被这种讹诈和恐怖吓住了，说了假话。他显然是一个有很深的道德感的人，尚且如此；一般人在“斗争会”的赤裸裸的恐怖中，更是无从抵抗。甚至到文革后，有勇气谈论这样的往事的人也很少。

上文引用了傅柯对惩罚历史的描述，应该在其他欧洲历史书籍中也能看到。傅柯更值得注意的观点，是他对中国革命中的群众专政和血腥暴力的赞赏。这不但牵涉到事实（他显然不懂中文也没有访问过中国，也不是中国事务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对中国发生的事情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的），而且事关基本的价值观念和入道观念（他有限的关于中国的知识首先是建立在他的基本判断原则上的）。他称赞中国国家机器“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引自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一个中国人眼中的傅柯》一文），北京《万象》杂志，2000年9月号，页51—62。）郭建教授对此提出了批评。傅柯现在中国很有一些追随者。笔者认为，应该对傅柯提出的这些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毕竟对中国人来说，暴力迫害是切身之痛，而不是他人的事情，不能允许用轻浮的态度来支持和肯定暴力。

#### 4，家人被迫“斗争”亲人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内打死了三个人。有语文老师靳正宇，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还有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在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和姜培良一起被“斗争”的还有校长高云，以及已经被指控为“牛鬼蛇神”的老师们。高云被打得昏迷后，红卫兵认为他死了，把他也运到了火葬场。火葬场有太多被打死的人要排队等候。高云在死人堆里苏醒过来，回了家。数名受访的老师听过他本人讲这段可怖的经历。

在大礼堂舞台上打人的时候，红卫兵用了有钉子的木棒，一打就把肉丝刮下来，鲜血淋漓。会中还有人大喊，“拿盐来。撒在他伤口上。”姜培良有一个儿子在这个学校初中读书，红卫兵把他儿子叫到台上去，让他打父亲。他儿子拿起一根木棒打了。姜培良在会上被打死。后来姜培良的儿子一直精神不正常。

文革中北京大学铅印的一本小册子里总结和鼓吹的“先进经验”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从九岁女孩身上看到了什么》，署名“中文系一排四班”。这篇文章介绍了怎样动员九岁的女儿来迫使历史系一名教师“坦白交代”。另一个系的领导人的女儿说，1968年，系里面“斗争”她母亲，系里的大学生来家里叫孩子们去，要他们“揭发”和“划清界限”。她14岁，她不肯去。弟弟10岁，就被大学生带去了。

1970年3月19日，北京大学召开大会“斗争”数学系教员刘品馨。根据一位教授所作的记录，军代表宣布刘品馨的“滔天罪行”是“攻击毛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运动，攻击五七指示（毛泽东的一个指示），罪大恶极”。会上还有三个发言。其中第一个发言人是她的丈夫，也是大学同学及同系教员。发言说，他和刘品馨共同生活八年之久，不知道其为反革命分子，已离婚。他“揭发”了刘品馨在家里说的和做的事情，包括反对在家中挂毛泽东的画像和下乡劳动时怕苦要丈夫寄饼干。他并要求“（给刘品馨）戴上帽子实行专政”。刘品馨19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校任教。她出身于教员家庭，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家人叫她“小五”。她结婚的时候，系里同事（很多人也是她的同学）去祝贺，送了一副押韵的对联“聪明如XX（丈夫），美丽如小五（新娘刘品馨）”。文革毁掉了她的家庭和她自己。因为反复被“斗争”，刘品馨发生了精神失常现象。她在1996年12月24日去世，其时不到65岁。

“斗争会”已经把被“斗争”者置于绝对孤立的境况，把他们的家人也拉到“斗争会”上来“斗争”他们，是剥夺了他们最后的可能的避风港，就是“家”。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精神和感情上也被彻底“打倒”了。其中的残酷，是稍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很容易懂得的。笔者还需要指出，这种分离子女和配偶，强迫离婚和子女改姓的做法，后来在“红色高棉”那里也被大量使用。

这种方式实际上不但给被“斗争”的人，也给参与“斗争”他们的亲人带来了重大心理创伤。上文写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胡志涛，在1966年8月5日的“斗争会”上被打成骨折重伤，并且目击多年的同事卞仲耘副校长被打死，在1968年被连续“斗争”48个小时。那时她的小女儿还在小学。后来小女儿就近入学升到那个中学。学校里继续不断“斗争”胡志涛，小女儿被安排在主席台前第一排，让她带头喊口号“打倒胡志涛”，她就喊了。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小女儿发生了精神忧郁和焦虑，不能集中注意力，不断回想自己喊口号“打倒”自己的母亲的情景。她姐姐劝慰不起作用，告诉了母亲。姐姐后来宽慰地告诉笔者，母亲毕竟是几十年的教育工作者，知道怎么治疗心理问题。母亲和妹妹谈话后，妹妹逐渐恢复了健康。至于其他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幸运得到治疗，还是个问题。

## 5，“斗争会”和死亡

据笔者的调查，全国最早在“斗争会”上被打死的人，是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1966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拉到学校。那里已经有一个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帮份子大会开始”。一群干部和教师被拉到台上“斗争”。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黑帮”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接着他们又被拉到大街“游街”。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横拖着，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有一里来路。李敬仪的身上磨得血

肉模糊，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脚上的肉被磨光了，昏迷不醒。两天后他在8月5日死去。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3岁和56岁。

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了五名校级领导。卞仲耘副校长（50岁）被打死，其他四人被严重打伤。“斗争”的方式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用开水烫，强迫挑大土筐，挑不起来就打，等等。卞仲耘的尸体上有大量的血窟窿。她的手表被打坏，钢表带上有撕裂口子（可见于胡杰制作的纪录片《我虽死去》）。该校位于北京市中心，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后，中共北京市委，国务院办公厅等都来过人了解情况，唯独公安局没有来人。

“斗争会”上杀人，不但没有成为罪孽和耻辱，却成为功绩和光荣。在南京师范学院，1966年8月3日的“斗争会”杀害了两个人的生命，后来那里成立的文革组织，以这一日子命名，名称叫做“八三造反师”，简称“八三师”，是南京文革中最为活跃的“群众组织”之一。“八三师”掌权的时候，在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里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为了纪念他们的发起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的高度是八点三米。在北京，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在8月18日的百万人集会上给毛泽东献上了红卫兵袖章。甚至直到2007年，她还把这张照片放在她成为该校90年校庆选出的90名杰出校友的展板上。

8月17日，北京101中学“斗争”十多名教员和领导干部，美术教员陈葆坤被打死。8月20日上午，北京女三中召开“斗争会”，校长沙坪被打死。8月25日，北京女十五种校长梁光琪在校中被红卫兵“斗争”打死，她被虐杀的细节中包括强迫她喝尿。8月27日，北京第三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在操场上召开“斗争会”，“斗争”学校附近居民中的“牛鬼蛇神”。武王侯祠胡同16号居民栗剑萍（40岁左右）在台上被红卫兵一棒子打倒。一名受访者说，他当时在台下同学当中，随即听到一片喝彩声。很快栗剑萍就被乱棒打死了。罪名是“土匪婆”。

这种当场当众打死人的“斗争会”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中大量发生。仅北京一地，就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残暴行动，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杀人形式。也就是说，不是派专业刽子手杀人，而是把人“斗争”死。1966年8月27日，北京的著名掏粪工人时传祥到清华做报告。一名当时的清华学生说，他听到校园大喇叭里时传祥说：红卫兵小将打死多少，我们清洁工人就拉走多少。（后来时传祥自己因为受过刘少奇的接见和表扬被指控为“工贼”并被驱逐出北京回原籍死在那里。）当时，北京街头开过堆满尸体的卡车和平板车，尸体上没有姓名标记，开往火葬场烧掉。家住北京西单的一名目击者说：尸体身体裸露（因为衣服已经被打烂了，当时又是最热的时候只穿单衣），就像生猪片一样堆在车上。一位9月13日到过北京火葬场的北京大学教师说：那里草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尸体，非常可怕。

这种暴力“斗争”的极致是吃人，把被“斗争”的人打死，然后吃他们的身体。1968年在广西，吃人不是个别发生的。广西有十万人惨遭“斗争”死亡，有数百人被吃。被害死被吃的人绝大多数是所谓“阶级敌人”。在笔者作的很有限的对广西情况的调查中，有一名受访者的父亲在“斗争会”后被吃掉，还有一名受访者看到村里架着锅煮人肉吃。

“斗争会”杀人，显然和一般的打人行凶犯罪有很大不同。后者一般是秘密地作的，而且是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作的。“斗争会”打死人则在大会上公开进行，配以大声的口号其他夸张性动作，甚至是在“喝彩”声中进行的。从前被判了死刑的人，还允许和家人告别，由职业刽子手执行处死。在“斗争会”上被折磨死，人的最后的尊严即死亡的尊严被彻底剥夺。历史

上被判了死刑的人没有遭到过这样残酷的虐杀。不难理解，世界上没有比这种在“斗争会”上打死人的方式，能造成更大的恐怖和威慑效果。

在历史上，有人在绞刑架前发表演说，有人在法庭上发表辩护词，也就是说，虽然死去，但是可能成为历史上的“烈士”。“斗争会”不给任何人提供这种做“烈士”的可能性。这种彻底的镇压方式，是文革肆虐十年几乎没有遭遇到任何公开的反抗者的原因之一。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在“斗争会”上打死的卞仲耘校长在那天早上离开家的时候，对家人说：他们“打死我这样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她被虐杀而死。她死后，警察不曾来过学校做例行的检查，尽管学校位于北京市中心。就如卞仲耘校长所说，“斗争会”把人像“一条狗一样”打死。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斗争会”还直接导致了数字巨大的“自杀”者。他们在被“斗争”之后“自杀”，或者在得知自己将会被“斗争”而在“斗争会”前“自杀”。自杀二字上加了引号，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斗争会”所杀。

在黑龙江省密山县的八一农垦大学（1958年农垦系统办的学校），1966年8月28日召开全校“斗争大会”。会上，一批教员被脸上涂了墨，还被强迫围绕主楼在地上爬行。陈自成、王亭（女）夫妇原是辽宁大学的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一起被送到“北大荒”。当晚他们夫妇一起服安眠药身亡。时年分别为44、40岁。同日校中另一名教员在被“斗争”后“自杀”未死。陈自成、王亭死后学校里还再开大会，叫他们的小儿子（11岁）上台发言表态，批判已经死亡的父母。这个学校在兴凯湖边靠近国境，但在实行迫害方面，紧跟北京。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运动发源地），文革中有两名教师“自杀”，都是在“斗争会”上被“斗争”后立即发生的。首先是物理老师刘澍华。1966年8月26日下午，刘澍华在高二的教室里被“斗争”。他和女老师顾涵芬并排跪在教室前面的地上，一边听“批判”发言，一边被铜头皮带打。他们被“斗争”了一个下午，顾涵芬一只眼睛被打伤，肿起来鼓得像个鸡蛋。她的这只眼睛从此基本失明。她的丈夫当晚送顾涵芬去了医院。但刘澍华和十多名老师干部一起在清华附中教学楼五楼大教室更多的学生面前继续被“斗争”。他班上的一名学生说，刘老师跪在地上，被一名高三的女生用铜头皮带狠狠抽打。“斗争会”直到深夜才结束，刘澍华在会后爬上了清华锅炉房的大烟囱上往里跳了下去。两年以后，在五楼的另一间大教室中（该校五楼有两间大教室），体育老师赵晓东遭到“斗争”和殴打。“斗争会”结束后，他从五楼下楼，在五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拐角的小窗户里跳了出去。一名受访者说，他跟在赵老师后面走，眼看着赵老师钻进窗口跳了下去。赵晓东白色的脑浆溅落在教室楼前的水泥地上。

还有人在“斗争会”之前“自杀”。1966年8月，除了教师刘澍华，清华大学附中还有两名女学生“自杀”。一名高一女生遭到单独关押一个星期后，8月8日逃出学校去卧轨。火车头把她推出了轨道，她没有死，但是导致终身残疾。另一名高二学生郭兰蕙在8月20日星期六得到红卫兵通知，将在星期一开会“斗争”她。她在星期六当天服毒，然后在医院地板上躺了一周后死亡（该校红卫兵通知医院不抢救）。父母给她起名如此美好，望她如兰似蕙，洁净芬芳，但是她才19岁就被迫害身亡。

北京大学生物系动物教研室助教李大成平时喜欢信手涂抹。有人在一张报纸上发现它手写的毛泽东的名字旁边有“打倒”二字，加上他有亲戚在香港，他被指控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北大里没有人会真相信这会给毛泽东带来任何损害，但执掌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布要对他开“斗争会”。在“斗争会”的前一天，1968年10月23日，李大成从生物楼三楼跳下身亡。时年32岁。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告诉笔者，她当时是“摘帽右派”身份，曾经在校园“劳改队”中，那天她正忧心忡忡低头在生物楼前走过，李大成落在离她两米开外的水泥路面上。

南京第13中学两名教师在同一天死亡最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被打死和被“自杀”的关系。一名受访者写信给笔者：

韩康，南京第十三中学图书馆员，因以前曾参加过国民党，1966年9月5日早上被十三中的红卫兵揪到学校操场上批斗。另有十三中体育教师夏忠谋，也因历史上有参加过三青团等“问题”，一起被揪到操场批斗。批斗中，红卫兵对二人拳打脚踢，用皮带抽，用砖头砸。红卫兵说韩康的态度不好，对韩打得更是厉害。直至下午三四点钟，韩康两三次昏死过去，但都被红卫兵用冷水泼醒后再接着批斗。到傍晚，韩康终于被活活打死。夏忠谋因一直低头任由红卫兵批斗，所以侥幸没有被当场打死，晚上他被关押到学校实验室，外面有红卫兵看守。夏忠谋看到韩康被打死，自己被关押第二天要接着批斗，肯定是难逃一死，因此晚上用衣服撕成布绳上吊身亡。两人都死于1966年9月5日一天。

自杀者在文革时被称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在文革后，还有人指责他们“性格软弱”，“胆子太小”等等。但是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会想到，自己在那样的情境中会做什么？自杀表示不愿再喊万岁，表示不愿再“低头认罪”。他们死了。实际上，相对而言，自杀是当时发生的最强烈的对文革的反抗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他们死后还要对他们开“斗争会”的重要原因。

在采访中，一名中学教员告诉笔者：他在文革中被“斗争”的时候，反复告诉自己一句话：他把古话“士可杀不可辱”改成了“士可辱不可杀”。他每天向自己复述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从，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骂自己就骂自己。他就这样忍受着，活了下来。

至少还有两位受访者也告诉笔者，他们怎么用“可辱不可杀”来帮助自己忍受“斗争会”的身体折磨和精神侮辱。三名受访者在不同城市或不同单位工作，却不约而同地用了同样的方法，活了下来。“士可杀不可辱”出自儒家经典《礼记》，我以为应该理解成激励人们尽可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和道德原则，并不是说人只有在受侮辱和死亡之间作选择。只有在文革中，人们才真的被迫在死亡和被侮辱中选择一种。文革残酷地摧毁了人的尊严和道德，于是这句古语也被颠倒运用。

## 6，“斗争会”成为常规政治仪式

在人类文明中，存在很多“仪式”，比如，婚礼，葬礼，等等。这些仪式在文明中有重要作用。文革中，“斗争会”不但成为一种普遍的公共活动，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规的政治仪式。

“斗争会”可以和庆祝活动安排在一起。1967年6月1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在校中建成巨型毛泽东塑像。七万人在北京大学开大会庆祝塑像落成（显然七万人中的大多数是从校外来的），庆祝活动中的一项，是把北大的“黑帮分子”揪来会场“斗争”。（1967年6月5日《新北大》报纸报道。）

“斗争会”成为文革的最重要的两种日常“仪式”之一。另一种革命新“仪式”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包括建造大批毛泽东巨型塑像，要求所有人每天向毛泽东像做“早请示晚汇报”和跳“忠字舞”等。在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斗争”和庆祝，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对毛的崇拜，编织在一起。当文革研究进一步发展，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两者是怎么结合起来而且互相促进的。

“斗争会”甚至成为“节日”的一部份。文革中，当局常在节日前安排大会对“阶级敌人”宣判死刑或者判处长期徒刑的“公判大会”，这是“斗争会”的一个亚种。1968年4月27日，即五一节前夕，上海在文化革命广场开大会宣布判处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等七名“现行反革命”死刑。“七名现行反革命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时场内场外的革命群众长时间的高呼口号，无不拍手称快。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1968年4月28日《解放日报》）古代的人在节日时向上帝献出牛羊猪作为“牺牲”，文革却是拿活人来代替。

“斗争会”成为文革日常生活的固定的一部分。一名在黑龙江省农村当过“知识青年”的受访者说，他1969下乡，不满16岁。一天收工很晚伙房没有饭吃了。他说了“不给饭吃，以后不再加班了”。“指导员”组织开会“斗争”他，罪名是“煽动罢工”。知青宿舍里，三面靠墙是火炕。被“斗争”的人站在中间的地面上，别的知青在炕上，“批判”和“揭发”他。“斗争会”开了三次。最后一次天气比较暖和，场地移到了队上的大棚子里。另一名知青和女朋友未经允许跑回天津家里，回来后也开他们的“斗争会”。队干部给他们定的罪名是“逃兵”，老乡们感兴趣的是盘问男女关系细节，倒也使得“斗争会”不那么严肃凶狠，只是羞辱。对于干部来说，“斗争会”则似乎成为一种使用方便的管理方式。

文化人类学对“仪式”有相当多的研究。会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人类自己的生活及意义。这是文革历史研究深化时可以借鉴的。文革中“斗争会”的日常化和礼仪化，显示着“斗争会”哲学和模式被普遍接受的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的权威性。当报纸称上海人对在节日前枪毙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拍手称快”的时候，被迫害者怎么能不被“斗倒斗垮斗臭”呢。

（未完待续）

~~~~~

【当事者言】

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下）

• 徐景贤 •

（编者按：本文为徐景贤《最后回忆》第五章，上接zk1501a）

◇ 寻求“中央文革特派员”的支持

这时形势已经十分紧迫，市委一直在找我，问我到哪里去了。我怕时间拖久了消息泄漏出去将会出现很大的阻力，就赶快串连市委某些部门已经露头的造反派，请他们一起来共商大事。我自己打电话到市委办公厅，找党刊编辑部的造反组织。当时他们的负责人是陈坤生，由王承龙负责对外联络，我打电话去正好是王承龙接电话，他原是黄浦区五金行业的支部书记，后调到《支部生活》编辑部当记者，我告诉他市委写作班决定起来造反，现与你们联络，想要共同筹开一个大会。他听了很兴奋，马上带了一个叫朱玉佩的女编辑赶来。我又打电话给宣传部造反派刘耀宗，进行串连。写作班的其他人也分别打电话给教卫部、市委党校、社会科学院的造反派，把他们都请过来，在十二月十五日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上决定参加全市批判大会的各部门，各自准备一个发言，形成揭露市委全面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势。同时，准备成立一个联合的造反组织，名称叫“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把原来比较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而且就在写作班宣布造反的大会上，同时宣布“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正式成立。事不宜迟，大会召开的时间定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只有三天时间了，讨论了一下分工：郭仁杰负责会议的组织和发言内容、程序，王承龙负责会

议的后勤工作，包括会场布置和通知发放等，程绮华和朱永嘉负责串连市委机关造反派，吴瑞武负责起草《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我算总负责，拍板、协调各项筹备进程，但要集中力量准备好自己的发言稿。大家认为，我的发言是整个会议的重中之重，我的发言中，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演变、心路历程讲透，同时要揭发市委在幕后搞的一系列活动，这样才能取得全市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就在筹备大会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解放军报》驻上海的记者甄文君。他是一个师级干部，穿着军装，年纪有五十多岁，模样显得非常稳重。他可是当时上海的重要人物，我在市委书记处多次见到他，市委书记们对他都非常尊重，向他介绍文革情况，他只是“嗯、嗯”地听着，从不表态；而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也纷纷找他反映情况，称他为“军报记者”、“中央文革特派员”。一个记者怎么会有这样特殊的身份呢？原来在军报驻上海记者站的背后，确实有着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出的政治背景：一九六六年八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军报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定名为《快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这份直通最高领导的内部刊物，发行量虽然只有几十份，但必须最迅速、最直接地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汇报各地和各系统的重大情况。为此，中央文革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从全国调集一百名团以上的干部，派往全国各地，以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身份，到各地收集情况并上报。《快报》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为了提高效率，最后甚至把《快报》编辑部的办公地点搬进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一起办公。甄文君当时就是派到上海担任驻沪记者站的负责人。市委领导人和造反派的头头都知道他的特殊身份，都想通过他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反映情况。我要王承龙找到甄文君，告诉他市委写作班的造反打算，甄文君马上赶到武康路二号，和我密谈了一个小时。他很认真地倾听了我们对市委的一系列看法以及筹开造反大会的各项安排，热烈地紧握着我的手，同意立刻向中央文革汇报。我从内心感到他是支持我们的，而且我们的动向可以通过他直接反映给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我更放心了。

召开大会的筹备工作有了眉目以后，我又打电话给姚文元，汇报我们写作班已经和市委机关的有些部门进行了联络，决定联合召开大会批判市委，同时宣布写作班造反。大会的名称就按照姚文元过去提醒我们的主题，定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会上由我做重点发言，还组织了其他几个单位的发言，之后宣布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会场拟设在文化广场，那里可以容纳一万多人，把市委书记、常委全部叫来接受批判，影响大一点。姚文元非常谨慎，他仔细听了我汇报，对会议的名称、批判的内容、叫什么人来接受批判等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他最后说是否要开这么大的会，是否能小一点，放在市府大礼堂开就可以了。我说按大家的意见，要开就开大一点，他还是不很赞成。经他这么一说，我很为难，筹备会上大家决定会要开得大，市府大礼堂只有一千多个座位，红卫兵首先不赞成，工人造反派说要派几千人来参加，一千多人的位子怎么容得下？再说，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止一千多人。所以姚文元对开会的规模说了两次，我在电话里不好反对，只好说跟筹备小组再商量一下。随后，我将姚文元的意见向大家传达，所有人都不赞成，大家都说，我们开，开起来，开大的，只有文化广场容纳得下。这样，在会议的规模上违背姚文元的意见也顾不得了。

◇ “火烧”“揪出”“打倒”“砸烂”四个口号的提出

大会的主题是彻底批判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批判市委领导人的具体口号怎样提呢？大家又进行了讨论。因为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从来没有出席过全市的批判会，他当时患鼻咽癌在西郊养病，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的第一线工作都是由市长曹荻秋负责，陈丕显一直在幕后指挥，我们觉得这一次不能再让他躲在幕后，一定要他到场听取批判，逼他到前台来。而他是第一次公开露面，还没有激起群众义愤，所以批判的温度不好太高，口号就叫“火烧陈丕显”。当时毛主席讲过，所有的革命干部都要在伟大的群众运动的烈火中“烧”一下，考验一

下，所以我们对陈丕显提了一个“火烧”的口号，至于“烧”成什么样，“烧”过后是不是要打倒，待“烧”了以后再定。至于曹荻秋，当时我们认为他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因此北京来沪的红卫兵和上海的造反派对他的意见特别多，他一直在主持上海市委的工作，被骂为“曹老头”、“面包老头”（专门给红卫兵和造反派发面包的），民愤较大，所以对他就提“揪出曹荻秋”的口号。还有一个分管文教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当时在上海名声已经很“臭”，复旦大学造反派揭露杨西光耍手法打击压制复旦大学的干部和群众，并把复旦大学党委抛出来，所以复旦大学造反派已经对他喊出了“打倒”的口号。我们写作班对他印象也不好，因为他接替张春桥分管写作班以后，没有抓什么批判文章，反而让我们做了市委的挡箭牌，为了和复旦大学的口径一致，我们对杨西光也宣布“打倒”。最后确定了三个大会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

口号拟定以后，就派朱维铮去借会场。朱维铮当时是“罗思鼎”小组最年轻的成员，组里其他人都是党员，他是共青团员，冲冲杀杀的劲头十足，好多事情都派他去打前站。那时候，文化广场每天都安排召开各种各样的大会，一会儿复旦大学，一会儿华东师大，一会儿又是哪个系统，都排满了。我们以市委写作班的名义去定十二月十八日的会场时，他们说已给人家定掉了。一打听，那天将是华东师大红卫兵召开的对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原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的批判大会。华东师大红卫兵是属于“红革会”系统的，朱维铮就直接冲到华东师大去了。他说我们市委写作班要宣布造反，市委机关要召开大会成立联络站，这是大事，你们一定要支持我们。

朱维铮在华师大碰到了北京大学的李醒尘，李是聂元梓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七名起草人之一，北大哲学系的教师。当时聂元梓派他到上海，留在北大驻沪联络站，就是要鼓动华东师大红卫兵共同批斗曾在北大蹲点的常溪萍的。聂元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来过上海，没有跟我见过面，有的回忆录和文章说，聂元梓到上海来的时候策动我造反，没有这回事，可能是把李醒尘当成聂元梓了。那次朱维铮到师大借会场的时候，李醒尘与朱维铮见了面，他打听市委写作班是什么人造反，朱维铮就说是徐景贤带领写作班起来造反，徐是支部书记又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一亮底牌后，李醒尘和华东师大“红革会”商量同意把会场让我们使用，但提出的条件就是要与我见一次面，看我们是真造反还是假造反。朱维铮就把他请到武康路二号，当时一起见面的有我、郭仁杰和朱维铮。我把自己正在准备的发言稿的内容跟他说了，还介绍了我们串连市委机关的一些部门造反派的情况，他才相信了。我邀请他参加十二月十八日的大会，因为会场是他们让出来的。华东师大红卫兵提出希望当天要把常溪萍也揪到会场来，我们说这完全可以办到。他们又要求大会的口号要跟常溪萍有关，因为他们的会议本来是集中火力批斗常溪萍的。文革以前，常溪萍从上海调去参加过北大的社教运动，我们认为他早已是被打倒的“死老虎”了，上海市委也保不住他。按照常溪萍的职务，还不够我们这次造反大会的级别，我们通知到会听取批判的都是市委书记、候补书记和常委这一档次的，我们想大会的口号已经用了“火烧”、“揪出”和“打倒”，再加上一个常溪萍，口号还能升级到哪里去呢？琢磨琢磨，比“打倒”再厉害的就是“砸烂”了，为了照顾华东师大出让会场的情义，我们临时同意再增加一个“砸烂常溪萍”的口号。这就是后来毛主席所称赞的“有区别”的四个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 《造反才知主席亲》发言稿的难产

我那段时间还要起草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几天没有睡觉，我感到任何时候写文章也没有这次写得这么辛苦。当时推选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勤务组，推了四个勤务员：我、郭仁杰、王承龙和程绮华。我的发言稿定名为《造反才知主席亲》，来源于我去复旦大学“留学”期间红卫兵送我的一副对联：“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发言稿初稿写好后，在勤务组内部就没有通过，他们听我念了一遍，认为造反精神不够，他们说：你一定要讲明市委是怎

么利用你的，要揭露市委的幕后活动，市委领导是怎么策划整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又怎么派人背后调查那些人的材料？还要把你推出去充当什么角色，做什么事情，统统都要加以揭露。你在会上揭到什么，就当场把这个人揪上来批判，要他承认事实。你的发言稿要有力度，要和整个大会的战斗气氛保持一致，不能像平时的讲话那样从头念到底，要不断形成高潮。比如，当场追问：“陈丕显，你在幕后对曹获秋下过什么指示，你回答！”，陈丕显就被迫出来回答，回答不老实，你就把它揭露出来，狠狠批判。而且，你的发言稿要真实地解剖自己的心路历程，说出自己不怕丢掉“乌纱帽”决心起来造反的曲折思想斗争，这样才能取信于广大红卫兵和造反派战友。

我的发言稿多次修改都通不过，使得我非常苦恼，勤务组帮了几次，最后请来《支部生活》的女记者、当时机关里造反精神最足的女将徐桂芬，督促我改稿。在他们的集体帮助下，我的发言稿才改出来。我深深体会到：从“保皇派”转到造反派的思想历程是非常艰难的，比如说我觉得自己连“革命造反派”这个名词都说不出口。当时陈伯达、康生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不直接称呼革命造反派的战士，而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总称叫他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发表文章时的标题也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总觉得应该和中央的提法和口径保持一致，我前几天还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一下子变成造反派了，总得有个过渡，所以我的发言稿的开头也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但勤务组的成员们说这个不行，这是折中主义，上台就要亮出你是造反派。要公开宣布：我造反了，我造反造定了！就要打这个旗子！你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的不行，一点折中主义都不能留！你对市委就是温情主义，老是割不断你跟市委的联系。当时盛行“炮轰”的做法，我虽然做了勤务组的头头，对于我的发言稿，一会儿这个人“炮轰”，一会儿那个人“炮轰”，意见非常敞开。我只得照听照改。

等到稿子修改定稿（参见附录四），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了，十八日就要召开大会，文化广场足足可以容纳一万多人，怎么通知有关人员出席？时间紧迫，一方面由市委办公厅通知当权派，一定要他们按时到会听取批判，另一方面赶紧组织群众队伍。有一些中学红卫兵组织非常积极，派出很多人给市委机关造反大会到马路上公开贴海报，让全市都知道。“工总司”派了工人队伍到文化广场压阵，“红革会”调来三千红卫兵到场维持秩序，壮大声势。当时市委机关还没有完全瘫痪，只不过有些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从延安西路三十三号转移到外面了，例如宣传部转移到思南路办公，组织部又转到另外一个地点，首脑部门怕红卫兵、造反派冲击，不能正常运转，都有点转入“地下”的味道，但通讯联络是保持畅通的。机关外面的人都找不着门道，但瞒不过我们这些机关内部的人，我们经过串连，市委机关本身的大多数普通工作人员听说写作班和市直机关的好几个部门联合起来造市委的反，都很惊奇，区、县、局党委的机关干部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闻风而来，想听听我们到底说些什么。

一切准备就绪，我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回家了，只是在武康路二号的小房间内临时打个盹。十二月十八日凌晨，在我决心迈出这关键的一步的当天清晨，我独自走到武康路二号楼下大客厅里的壁炉旁，四顾无人，我就拿起炉台上的电话机给我妻子葛蕴芳打去电话。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她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告诉她这几天我们写作班开会的情况，我说我们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下去了，我们决定造市委的反。葛蕴芳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解放后曾经在市委机关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市人委文教办公室工作。她觉得市委就是党的化身，在她思想上认为对这样一个市委是不能造反的。因此，当我告诉她我们今天要开会宣布造反时，她很吃惊，问：“你怎么造反？”我说在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的支持下，我们要在文化广场开一个大会，我将来在会上作一个发言，揭发市委。她担心这样做的后果：“这么一开会，市委要对你采取措施的。”我说：“无非是最后把我下放到农村劳动去，我现在的职务，最多也就是写作班的支部书记，我再也不能做市委的挡箭牌了，我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希望你支持我。”我动员她下午到文化广场去，听一听会上的发言是怎么回事。我跟她讲话的时候比较激动，在电话

里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带有悲壮的味道。这说明，就在召开大会之前，我对自己的政治前景还是没有十分把握的。

◇ “市委真的‘心脏爆炸’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全国第一个省、市委机关的造反大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了。

所有的上海市委书记和常委，破天荒地第一次全部到场听取批判。这次大会由于是市委机关干部自己起来造反，“勒令”所有市委书记和常委都要到场，所以他们一个也没有缺席。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王少庸、杨西光、宋季文、李干城等人在台上站成一排。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因病处在后台，这次也被迫站到前台来了。陈丕显后来回忆他第一次参加批斗会的心情时说：“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站在群众的面前。文化广场是市里过去经常开大会的地方，这主席台是我经常做报告的地方，可今天我竟作为被批斗对象站在了这里。自参加革命以来，在党组织的关心下，我似乎没经历过什么明显的‘逆境’，一直是处在‘顺境’之中，没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境，此中心境，难以言表。”

和陈丕显等同时到会听取批判的，还有二十多名市委、市人委的部、局级干部，不过他们只能站在主席台的台下，听候点到自己的名字才能上台揭发、交代。

大会由写作班支部副书记郭仁杰主持，他宣布：“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现在正式开始！”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口号声，领呼口号的一男一女是朱维铮和戴厚英，他们两人在写作班合演过相声，嗓子响亮，普通话标准，呼口号时此起彼伏，配合得十分密切：“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被批斗的人也跟着举手，呼喊这几个口号。

接着，我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的身份，作了题为《造反才知主席亲》的重点发言。我发言的时间用了一个半小时，采取提到哪个人就叫哪个人交代的办法，我时时不忘记把揭发的重点放在陈丕显、曹获秋身上，比如我揭发市委要在本次运动中“抓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而且说“五七年反右时，全国揪出几十万右派，这次可能还要多一点。”我要陈丕显、曹获秋当场交代，陈、曹两人都推说“不知道”。我紧接着就要市委秘书长李家齐站出来揭发，他当场指证陈、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过这些话，他自己又如何向下传达的，揭穿陈、曹的“谎言”。我又让陈丕显的秘书出来揭发他如何接受陈的布置，向机关党委了解北京红卫兵的情况，说明陈丕显称病躲在幕后指挥的真相，搞得陈丕显十分狼狈。

除了我的发言以外，市委办公厅、市委党刊编辑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等单位的造反派代表纷纷发言，抛出大量材料，揭发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他们都成了市委“心脏爆炸”的“爆破手”；吴瑞武还代表“罗思鼎”小组和“丁学雷”小组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工总司”王洪文、北京大学李醒尘以及各个大学的红卫兵头目，听得非常有力。他们说：市委机关干部造反，内部材料就是多，击中了市委的要害，这次真的是市委“心脏爆炸”了！后院起火了！复旦大学“红革会”的负责人马立新代表北京、上海等各红卫兵司令部和各造反组织在大会上发言，对市委机关造反派杀出来表示坚决的支持。这说明我们的行动也取得了全市造反派的信任。

这个会对上海市委的打击非常大，确实起到堡垒从内部攻破的作用。过去，党的机关特别是高级机关对它的工作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如此，市委给我们强调

过几条，第一是“内外有别”，内部的东西不能弄到外面去；第二是严守纪律，不得擅自表态；第三是顾全大局，个人和小单位都要服从和照顾大局的利益；还有一条是高度保密，不得泄露党内机密。我们的造反大会一开，就把这几条都冲破了。党是靠组织纪律维系着的，党的首脑部门更是如此，现在把它内部的东西一下子捅出来，红卫兵和造反派兴高采烈，说徐景贤知道那么多东西，现在大胆揭发出来，真正是“起义”了。但是市委领导人却非常恼火，说我这样做是“叛变”，成了党的机关的“叛徒”，完全违反了党的纪律，背离了“内外有别”的原则。事实上，不仅在华东地区，甚至在全国省、市委一级的党委机关中，内部起来造反的，我们上海是第一家，成了名符其实的“领头羊”。

大会前，上海市委已经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北京红卫兵的冲击，上海的大学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工人造反组织的建立，使上海的整个形势比较混乱，市委已经难以招架。但因为机关里的人心未散，从市到各区、县、局的建制还比较完整，所以日常工作还能维持。但我们的造反大会一开，一切都乱了套。那天会场里挤得满满的，除红卫兵、工人造反派的声援队伍外，市、区、县以及各局级机关的干部也来了，他们参加大会后感到非常震惊，当时在他们眼里，市委文革小组是市委的一个领导部门，而这个部门里的一个成员居然宣布跟市委决裂，岂不是很震动？当时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由在市委领导下的市委文革小组出面处理各种事情的，先由张春桥担任市委文革小组组长，张春桥调去北京以后，由王少庸任组长，而那天王少庸也被揪到台上接受批判，说明市委已经没有威信了。在上海的机关干部眼里，市委写作班是整个市委的舆论班子，是市委的喉舌和代言人，现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部门都整体起来造反了，而且理由是要抵制市委的错误领导，宣布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坚决反对市委推行的错误路线，这样就把一大批机关干部都鼓动起来了，市委机关很快就陷入了瘫痪状态。

关于这次造反大会的影响，后来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里有如下的描述：

“徐景贤等人‘后院起火’、举旗造反之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机关部门的一些人纷纷仿效徐景贤的做法，一下子成立了许多造反组织。这股造反风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区、各县党政机关，一时间机关内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秀才’造反和群众造反确实不一样。这些‘秀才’原来大都是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进了写作班子之后又长期接触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大量市委机关的核心机密。他们根本无视党纪国法，把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被歪曲的事实散发到群众和社会中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陈丕显“造访”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

那天大会发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一直在硬撑，心力交瘁，几天没有很好休息，上台以前几乎有点支持不住了。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发言发好，自己既要勇于揭发市委，表达与市委决裂的态度和决心，又要真诚检查自己过去做市委工具的错误，取得各造反派的谅解。这确实是一件两难的事。

效果总算还好。那天，“工总司”的负责人、北京和外地各派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代表以及上海各级红卫兵组织的头目都来了，坐在主席台上。过去我曾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和他们打过交道，如今他们又来听我发言，看我究竟是不是真造反。我在发言中特别坦陈了我在造反过程中的矛盾心理，我说：“造反就是要破私立公。怕造反的人，千怕万怕，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我内心思想的真实写照。我发言完后，他们纷纷上前和我握手，我觉得浑身乏力，汗湿衣衫，人像瘫掉一样，但是心里感到很欣慰。

在回武康路二号的路上，市委党刊编辑部来的王承龙显得非常兴奋，他说：“今天的会开得很成功，今后要把所有上海的造反组织都统一在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旗下。”他忽然讲出这么一句话，我当时感到很突然，听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感到不妥当，我们只是上海的一个群众组织嘛！但我们的队伍中当时就有人冒出这种念头，说明有些人确实怀有一统上海天下的野心。

大会以后，虽然在上海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我想起姚文元在电话中曾经着重提醒我们：要造舆论，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群众。我意识到：光靠在大会上的发言，或是散发一些传单，这种舆论是不够的，我们要充分发挥写作班的优势，编出一期报纸作为大会专刊，广为散发，才能把影响扩大到全市、全国去。我说马天水在市委的几个书记中态度比较好，又可以代表市委批印东西，我们把大会发言稿和造反声明等编一张报纸，名称就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专刊》，大量印发。编辑者名义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时“红革会”提出，我们红卫兵支持你们这么多，又给你们会场，又帮你们忙，我们要和你们联合编报。“红革会”当时办了一张《红卫战报》，有一套班子，我就同意由市委机关联络站和“红革会”合编。事实上的执行编辑是朱维铮。他亲自撰写了消息，用了大字标题：“市委心脏爆炸 曹家后院起火 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炮轰上海市委”，消息用显著的位置刊登在《大会专刊》上，同时把我的发言稿，以及市委办公厅、市委党刊编辑部、市委党校、市委宣传部等造反组织的发言，还有市委写作班的造反声明等都登了上去，消息、发言、评论加上照片，像大型报纸一样编了两个整版，完全符合姚文元要我们多造舆论的要求。接着，我拿去叫马天水签字，一次印十万份，在《解放日报》排版并用滚筒机印刷，用最快速度印出，大量散发，轰动全市。

大会以后，武康路二号热闹非凡，这里变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人们川流不息地来，有串连的，有了解情况的，也有打听张春桥、姚文元的消息的，门庭若市。我们商量，这个地方长期搞对外接待恐怕不行，就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对外接待部门搬到淮海中路市委党校，那里交通便利，地方又宽敞，便于对外。内部的勤务组办公机构还在武康路二号，我也用较多的时间留在武康路，统筹安排整个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工作。

大会以后，市委各部、委如宣传部、组织部、教卫部、工业部、交通政治部、财贸政治部等纷纷杀出造反队伍，与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挂钩，很快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市委机关的造反系统，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有造反队，一直到市委最基层的工勤人员中连食堂里都成立了造反组织。最有意思的是市委警卫处的警卫人员也造反了，他们成立的造反组织起了一个名称叫“红色警卫员”造反队。警卫处的任务本来是保护首长的，群众刚起来时，要找首长谈判、开批判会，都由警卫员保卫；首长躲在什么地方，红卫兵、工人造反队根本找不到。现在警卫员一造反，你要陈丕显、曹荻秋他们到场，警卫员一下子就把他们找来了。这样一来，整个市委机关乱了套。

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午，陈丕显的秘书打电话到武康路二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说是“丕显同志要来看望你们”，接着，他就乘汽车到达了。说心里话，当时我实在不愿意接待他，一是他已成为我们的批判对象，我们不想和他拉拉扯扯建立什么说不清的关系，二是他此刻主动来找我们，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所以，我就拉了几个联络站的工作人员，把他堵在屋外的院子里，不请他进室内，几个人就这样站在露天开始了对话。陈丕显当时已按中央的指示停止养病、到第一线工作，但整个市委机关已指挥失灵，他感到举步维艰，先是想扶植机关里的保守派，但已经拉不起有影响的队伍来，于是他又调过头来想靠拢造反派。

陈丕显一反往常的首长派头，显得很谦恭、很亲切，就在院子里站着和我对话，其他的人

就围在身边。陈丕显说：“前一时期我一直在养病，市委的工作由荻秋同志主持，所以我对有些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你们起来造反我表示支持，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请尽管提出来。”

我听他这样说，就故意问他：“那你对我们提出的‘揪出曹荻秋’到底怎么看？”因为在我们看来，曹荻秋前一时期一直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无法主持工作了。

“这个，荻秋同志处在第一线，他也有他的难处……”陈丕显已经决心抛出杨西光和常溪萍，但对于曹荻秋，他不敢明确表态，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他们两个商量决定的。

陈丕显拼命把话题扯到别的方面，他说：“现在市委机关受到冲击，工作很难开展，我有一个建议：市委和你们机关造反联络站可不可以合署办公？不过你们这里地方太小，可以考虑换一个地方，房屋、车辆我都可以提供，经费也没有问题。”

我一听就知道这才是陈丕显此行的真实意图，我们岂能上他的这个圈套，如果联络站和受批判的市委合在一起办公，那我们还造什么反？全市的群众组织又会怎么看？我就断然回答：“这个问题不能考虑！”

站在旁边的程绮华、朱永嘉等人插嘴说：“我们不需要房子、汽车和什么经费！”

陈丕显看看谈不下去，讪讪地说：“那我们多保持联系吧。”就告辞走了。

陈丕显一走，武康路二号楼就炸开了锅，有的说：“想要和我们合署办公，休想！”有的说：“他提供什么房子、车子、经费，这是要收买我们！”只有党刊编辑部来的王承龙说：“车子、房子，为什么不能用？只要造反需要，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 毛主席表态支持上海机关干部造反

十二月十八日大会以后，我们并没有发电报或写信把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但开会的那天，《解放军报》驻上海记者站的记者甄文君就坐在主席台上，他听取了会上的全部发言，会后很快就把大会主要内容和所提口号，写了一个动态消息发在中央文革的《快报》上。毛泽东看到了这条消息，迅即做出反应，表示支持。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我们写作班昨天刚刚吃过后为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祝寿的长寿面，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号的草坪上，商量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时。忽然，文学组一个青年从楼里奔出来叫我：“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

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里面响起了夹杂着上海、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传达一下主席的指示……”

姚文元到了北京工作，也像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口称“主席”，省掉了“毛”。今天，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而且要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令我喜出望外，我赶紧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

姚文元在电话里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主席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一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一起过生日并祝酒，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向来不提倡祝寿，但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却邀请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共度生日，那天并没有邀请其他政治局常委、委员参加，这说明毛泽东越来越明显地想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早在六月十日他在杭州和各大区负责人谈话的时候，就说过：“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从这次祝寿活动来看，他正是有意从组织上开始实现这个目标。当然，祝寿宴很普通，按照毛泽东吃饭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此外，据姚文元说，每人还有一小杯葡萄酒。毛泽东兴致很高，在祝酒时说了一大篇话。除了姚文元给我在电话里传达的内容以外，据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录》一书中回忆，毛泽东还说：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在祝酒时对文革运动的规律做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我想：毛主席肯定和支持我们机关干部造反，就是希望我们和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相结合。他肯定上海的形势很好，就是因为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都发动起来了！

我听到姚文元的传达和王力的回忆的不同之处，就是据姚文元当时告诉我，毛泽东在最后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而王力回忆毛泽东说的是：“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我更倾向于前者。因为一、这更符合毛泽东的口语和风格，他后来还多次说过“全面内战”这句话；二、我是当时听的传达并作了记录；三、我立即向市委写作班的核心成员作过传达，他们可以作证；四、我后来又和姚文元作过核对，姚文元确认当时是这么说的，但后来在起草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为了文字更准确、更严密，改成了“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全国全面内战”也好，“全国全面阶级斗争”也好，实质都一样。

我们就在毛泽东号召和指引下，全力投入全面夺权的一九六七年。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